

## 以全面补贴解决“菜贱伤农”

陈功

最近,山东一位菜农因蔬菜价格暴跌而自杀震惊了舆论,“菜贱伤农”问题引起人们的热烈议论。农民因粮食、蔬菜、水果价格低、销路不畅而亏本、破产,甚至自杀的事件其实差不多每年都能听到,只是每年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种植的品种有所不同而已。

丰收与歉产,农民都成为受害对象。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说明过去的办法没有解决根子问题。国家将粮食生产定位于某种程度的公共品,对其给予补贴,但是蔬菜生产享受补贴的地区还不多,补贴的力度也不足,且没有系统化。由于蔬菜与粮食都是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从理论上,蔬菜也是公共品,也应该同粮食生产一样享受财政补贴。不仅如此,蔬菜与粮食相比,在品质上有重大差异,粮食保存时间长、蔬菜保存时间短,所以对于蔬菜的生产,补贴和支持力度应该更大。

给蔬菜生产有效充足的补贴,与农

产品的供求属性有关。我们知道,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一般是非常小的,换句话说,农产品供应和需求量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价格很大的起落变化,所以在丰收时,由于供应量大增,就会让销售的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如果第二年农民由于受到重创而减少生产,则第二年由于需求超过供应,就会造成终端销售价格暴涨而伤害平民,这也是那些“蒜你狠”、“姜你军”炒作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各国给予粮食生产以补贴的理论基础之一。由于蔬菜的保存时间极短,所以其需求价格弹性比一般粮食产品更大,蔬菜生产者遭受的风险比粮食更大,所以蔬菜生产需要社会关注,菜农更需要被照顾。

对于菜农极其容易受伤的处境,与目前对于菜农生产基本上给予忽视或者是照顾很少的境况是非常对立的。而要解决菜农的弱势和容易受到损害的处境,可以考虑按照公共品服务的办法,对于菜农给予特别的补贴与照顾。

至于补贴方式,可以参照粮食补贴的办法,按种植面积给予进行,补贴的

标准,应该是种子、棚建、人工投入等直接成本,只要有种植就有补贴。拿此次自杀的山东菜农例子来说,如果按照一个菜农人工补贴每年1万元,全家1.5个人工种菜的话,加上种子、棚建的补贴,6亩地的蔬菜种植,可以获得大约2万元的补贴,即使菜价再低,这个补贴足以让他全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和支出,也就能在来年继续再生产,从而不至于走上绝路。补贴的钱应该主要由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也应该按比例支付一部分。

蔬菜从田间走上城市居民餐桌,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一个流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障碍,都会倒过来伤害到菜农,所以不仅对蔬菜生产应该给予补贴,流通领域也应该给予补贴。在整个流程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运输物流成本。现在有些地方对于蔬菜运输的过路费免收或者减收,但是据闻有些地方这些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为解决这一问题,要加大政策力度,全国范围内运输蔬菜的车辆,应该一律免收过路费。在物流成本中油费是大头,因此,运输蔬

菜的车辆的油费也应进行补贴。可以让那些运输蔬菜的车辆,在始发地取得运输蔬菜的凭证,再在销售终端地取得运输完成的凭证,然后再根据凭证来领取油费补贴,而这笔开支也完全可以由各级财政来给予解决。

蔬菜批发和零售环节费用也很可观,费用过高即伤害消费者,也会倒过来伤害菜农,所以在这一环节,财政也应该给予补贴。目前一些城市的室内菜市场,提供摊位的方面往往是商业化运作,导致摊位费畸高,导致菜贩和消费者双双为高摊位费买单,所以需要还菜市场为公益服务的角色,将其作为公共品免费提供给菜贩。提供和管理这些摊位的费用,应该由当地财政给予解决。

如果将蔬菜从种植到零售环节都视为公共服务且给予全流程补贴的话,蔬菜生产者的抗风险能力将会得到增强,蔬菜供应也将更加稳定,终端消费价格也更加合理,这样菜农、蔬菜运输者、消费者的利益都可以得到维护,也就不会出现“菜贵伤民”和“菜贱伤农”这类现象了。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中心)

■鹏眼 | Huang Xiaopeng's Column |

## 社会融资总量能成为可靠的“锚”吗



黄小鹏

经过几个月的舆论预热和实际准备,央行不久前首度正式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数据公布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今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约为14万亿元左右。他还透露,条件成熟后,央行将会按月公布社会融资总量统计,他还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目前还只能说是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成为中间目标需要一个过程。

这一系列动作和言论显示,央行对将“社会融资总量”打造成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充满期待。可以预料,今后不论是央行,还是市场,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上来。如果各方对这一指标认可度高,甚至不排除未来会在年初公布一个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目标(今年14万亿的提法带有很强的非正式色彩),将其正式升格为货币政策之锚。

客观地说,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是在匆忙之中提出来的。此前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作中介目标并不十分理想,但央行为其寻找新的替代物的意愿也不强烈。是去年形势的变化促成了这一转折。2010年,在银行信贷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融资额激增。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更像是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一个“拐点”。尽管2002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占比早已出现逐步下降之势,但下降过程一直比较平稳,2010年占比由68.1%下降到55.6%,出现突降现象,同时,银行承兑汇票占比由3.3%突增到16.3%。在人民币贷款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全社会货币信用却出现了较大的膨胀,并直接推高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但是,以社会融资总量替代人民币贷款而成为货币政策新的“锚”,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如何呢?标准理论认为,衡量一个指标是否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从可测性来看,央行给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明确范围,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一行三会,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应该没问题。至于可控性,在社会融资总量的十大分项中,最易控制的是人民币贷款和外汇贷款。最难控制的是保险公司赔偿和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它们基本上独立于央行政策。其余各项的可控性居中。

不过,最大问题可能还是相关性。理论上,一个指标与GDP产出、物价之间的相关性越强,稳定性越好,就越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该指标与产出与物价之间有着固定不变的数量关系,就是中介目标的当然之选,央行只需在它身上下“锚”,即可轻而易举得到一个合意的产出和物价水平。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根据央行的研究,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消费、投资、工业、CPI)之间的相关系数,社会融资总量全部高于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总量相对于人民币贷款的优越性不容怀疑。不过,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间的稳定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0.85的相关系数不算高,而且相关系数可能

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历史数据显示,融资总量/GDP比率不仅存在趋势性上升,而且波动性也相当大。该比率从200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9年的超过40%,并且在短短8年时间内出现过两次突发性上升。从分项数据看,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债券的占比波动性最大,趋势性也不明显,几乎不存在什么规律。

如果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金融深化路径的非线性这一大背景,融资总量与产出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过去8年里呈现出这种不稳定性毫不意外,令人担心的是,这种不稳定性未来并不必然降低,存在出现更大波动的可能。因此,选择在这种相关性存在重大欠缺的指标身上下“锚”,很难达到稳定产出和物价的目的。

社会融资总量的这一缺陷与货币量、信贷量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后两者作为货币政策之锚的历史表现足以说明。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议采纳固定货币量增长目标,乃在于他论证了货币乘数(连接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连接货币量与GDP)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其《国货货币史》的核心结论。但是,货币量增长目标在实践中没多久就出了问题。随着金融创新的出现,货币的内生性越来越强,货币的定义越来越模糊,流通速度也越来越不稳定。“锚”所要求的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很快就不复存在。前不久,货币数量目标就被西方国家抛弃,现在美联储和美国金融市场已不再重视货币量,很多货币政策观察人士甚至将其从很多名单中剔除掉了。

信货量作“锚”的历史同样如此。1980年代,美联储一度实行私人债务总量目标,这背后也是由理论所推动。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与货币和GDP之间的关系相比,债务量与GDP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出人意料的是,债务量/GDP比率,即债务周转率新目标后被采纳后很快地变得不稳定,在十几年内急速地由0.7下降到0.5,最后,美联储也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

除了相关性方面的先天缺陷,中国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外延也存在不足。按照央行的公式,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事实上,这十项只是金融机构融资总量,并非真正的社会融资总量。理想的社会融资总量,应该将政府债务融资(尽管央行对其可控性为零,但其会对产出和物价影响巨大)和居民、企业间的民间融资、地下融资纳入统计之中。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民间融资、地下融资媒介的总需求不可小视,忽略所造成的精确度下降有时是不能接受的。

从更深一层意思上讲,货币量、债务量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失去货币政策之“锚”的地位,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金融创新速度越来越快、形式越来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将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之“锚”都是力不从心的。由于数量关系最终通过货币供求、融资供求的交互作用体现在价格(利率)上,所以,重点关注利率这一价格信号,放弃或降低数量指标在央行监测中的重要性,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实行以更多运用利率作操作工具、将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合二为一为特色的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与其花大力气寻找仅仅是次优的替代性中介目标,不如着眼于未来,加紧配套制度建设,为尽快转向通胀目标制创造条件而努力。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声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到ppl118@126.com。

朱慧卿/画  
孙勇/诗

## 菜价涨10倍罪不在流通环节

余胜良

消费者不用开车到山东、坐船到海南,就能吃上蒜薹、辣椒等时令菜蔬,这是由于菜贩们辛勤的劳动,如果以终端市场菜价对比菜农地头价,认为菜贩们攫取过多,流通环节有问题,实属偏颇之论。那种认为菜农直接供应超市可解决终端市场菜价高问题,同样太过天真。

农民因菜价过低自杀身亡,的确可叹。菜农的确非常辛苦,表达同情之心也很必要,但因此而对菜贩不满,就不够公平。菜贩是菜农的交易对手,很容易让人以为菜价下跌是由于菜贩压价。其实和蔬菜生产的自由竞争相比,贩菜生意也无法垄断,他们同样无法左右菜价。

1998年,笔者曾随长兄一起到菜市场卖菜,家里种了3亩地辣椒,开着

农用三轮拖拉机晚上12点出发,到60里外去,菜市场里都是本地的菜农,以及外地开着大车的菜贩,我发现即使同一天,价格也在不停波动,就像股市一样,很难说清楚下一步会怎么走。

蔬菜的地头价,主要体现的是劳动、农药化肥、地租等费用,而在跋涉旅行到居民餐桌之前,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就十分复杂。市民一般是从菜市场、超市买菜,在此之前,蔬菜已经过大致三个环节,首先是从蔬菜基地到城市批发市场,菜贩的风险是滞销,如果滞销就要便宜处理。卖菜是货到地头死,我哥进城卖菜,从来不拉回去,因为第二天就没法卖了,这跟可以库存的粮食不同。之后批发商还要将菜批发到各个超市和菜市场,在此期间,菜贩的费用包括运输费用、菜市场交易费用、装卸货费用、房屋租金、水电费、人员工资。

如果菜贩赚取了产业链中的大多数利润,他们将个个暴富,实际上在这个市场中,批发商发财和巨亏的故事一样多,在零售市场,菜贩的收入也仅够养家糊口。在一个没有多少进入壁垒的行业,不可能有超额利润存在。这也和我们普通市民们的感受相同,我们所见的菜贩,也正是辛苦的劳动者,他们需要小心保鲜,挑拣烂叶,热情招揽。大田菜价格很低,但没人亲往采购,算上时间和来往路费,显然家门口购买更为合算,对菜农而言,蔬菜往往集中上市,只能依赖批发商。

如果想降低菜价,而不得从流通环节找原因的话,那就是流通环节本身所需要的费用太高,特别是被人诟病的高速公路费用。我国物流效率整体不高,我国生产的不少商品批发给国外经销商,在国外售价还远远低于国内市

场,物流效率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有专家认为,可以甩掉中间商,采用农超对接方式,降低中间成本。农超对接这种模式并无障碍,但是可以降低菜价还有待观察。农超对接前,超市和菜贩拿到的价格差别并不大,由于超市运营成本更高,最终超市菜价远高于菜市场。就算是农超对接,这种情形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农超对接后,收购称重、运输配送等环节并不可免,以前中间环节所承担风险,将转移到超市。近期有报道称,天津施行“农超对接”后,各超市蔬菜价格普遍下降了5%至8%,这个幅度其实并不大,降价之后,超市菜价和菜市场价格相比也无优势。

### 焦点评论

## QE2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效应

张莱楠

美联储加息会议决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是意料之中的事,“美元本位制”早已经演变为“债务本位制”,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战略性贬值削减债务,另一方面,美元利用全球货币的主导性权力获得全球的剩余价值。

美联储向来把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的本质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一个可以称得上“天文”的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美国利用美元货币的“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品,已经达到2009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这些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

从二战后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实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GDP比率则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其中,通胀对减债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要靠不断地放水让美元贬值,从而启动

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收益。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替,美国早已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扮演着银行资本家的角色:即通过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来维持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实现比较优势的同时,获得相应的贸易和信贷利益。另外,美国通过在商品输出带动下的资本输出分享他国的贸易和投资收益,这是银行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最新数据,美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已经高达10.4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4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余下的7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资产置换呢?事实上,美国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相比,海外投资形成了高利润回报。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较大,而且各项风险值相差也很大,这表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好的低收益资产。

数据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3.32个百分点。以目前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模来算,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3450亿美元。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GDP增加值。

全球最大的不平等莫过于,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

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当前,美元指数接近2008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正意味着美国要通过美元贬值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然而对于全球前十大美元储备持有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由于通过贸易盈余积累的美元不能投资于本国货币为主的金融市场和本币资产,因

此,即便是美元和美债不再值钱,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还是要购买美元资产,这也是美元为何大肆贬值而没有任何约束的根本原因。

但是失衡的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储蓄赤字已经严重动摇了美元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而美联储的天量流动性正在加速这一过程。(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沪指再破二千九,中国股民心颤抖。道指承压却登高,日股抗震不低头。担惊受怕悲散户,唱多做空鸟机构。A股畸病未根治,运行机制要整修。